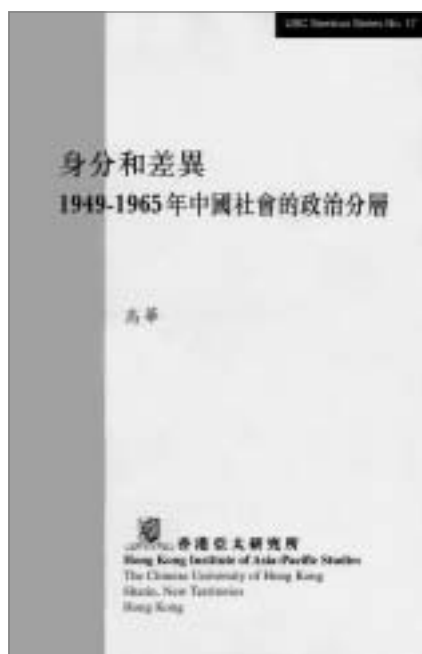


新實證主義的史學追求

——評高華的《身分和差異》

● 荊世杰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

高華先生的新著《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以下簡稱《身分和差異》，引用只註頁碼），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小書，但卻很值得引起學界的注意。這是一部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現有

程式的史學著作。讀了本書，讓人感覺找到了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

一 「階級出身論」的社會歷史根源

作者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界定的概念是：在近三十年間，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成員的階級出身問題，將階級出身作為檢測民眾對新政權政治忠誠度的重要識別標誌，並通過此項檢查，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政權基礎。由此出發，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的變化，對社會成員不斷進行政治身份類別的劃分和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這種強調階級出身的思想意識和依此劃分社會成員政治類別的原則，被作者稱之為「階級出身論」（頁1-2）。作者認為，這種思想及其實踐有着極為深刻的背景：遠的有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近的有俄國十月

「階級出身論」及其實踐有着極為深刻的背景：遠的有馬列主義的「徹底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階級鬥爭學說；近的有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在1949年後的十七年裏，「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進一步轉化成「階級血統論」。

國共兩黨的分裂、對抗是「階級出身論」勃興的契機，經歷此一挫折，共產黨人的階級意識明顯得到覺醒。大革命失敗後，知識份子階層的軟弱和退縮，造成了黨的領導層對知識份子的負面認識，有促成「階級出身論」走向成熟的作用。

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頁1）。而共產黨人在1950年後的理論和實踐，只不過是根據地時期理論和實踐的延伸和發展。在1949年後的十七年裏，「階級出身論」隨形勢的發展，在文革爆發後，進一步轉化成「階級血統論」，從而造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歧視現象（頁2）。

除了理論來源以外，作者還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革命實踐中探尋「階級出身論」的根源。在作者看來，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就顯示出一定程度重視階級出身的傾向，但這個階段的中國革命因為被認定尚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目標是反帝反軍閥，故對非無產階級還比較溫和。在共產黨自身的構成中，知識份子也佔了較大的比重。大革命階段，共產黨自身的階級意識仍未成熟。作者認為，國共兩黨的分裂、對抗是「階級出身論」勃興的契機，經歷此一挫折，共產黨人的階級意識明顯得到覺醒。大革命失敗後，知識份子階層的軟弱和退縮，造成了黨的領導層對知識份子的負面認識，有促成「階級出身論」走向成熟的作用。作者除指出這個時期的「階級出身論」受到蘇共「唯工農至上」的影響外，還特別注意到毛澤東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從1928年毛為江西第一個蘇維埃題寫有關階級對抗的對聯起，然後經井岡山地區的整黨、1930年代初的「肅AB團」、1940年代初延安的整風與搶救運動，到1940年末的土改整黨，作者非常完整地梳理出了以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為主線的「階級出身論」的發展脈絡。

作者還對「階級出身論」在中共黨內長期存在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意識形態與原則有利於黨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聚集社會支持，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加速建成黨的基層結構。這樣，作者就揭示出了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的依賴路徑。從這裏，我們也可以從深層明瞭各個解放區的土改中為甚麼會有過左的錯誤。無獨有偶，著名的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宗智也認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一直到文革時期，一直存在一種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的背離，也就是說，農村中階級成分的劃分有一定理論建構的成分^①。

二 「階級出身論」的不同發展階段

該書將「階級出身論」的發展劃分成不斷遞進的三個階段：(1) 區分敵、我、友：以「政治分層」重建社會（1949-1953）；(2) 強化革命專政和政治分層的細密化（1953-1956）；(3) 追求全面「純化」的新世界（1957-1965）。

依照作者的梳理，在1949至1953年間，「政治分層」成了劃分敵、我、友並重建社會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當務之急是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建立黨的階級基礎和新政權的社會基礎。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各階層依照「階級出身論」被重新定位：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

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份子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和反革命份子則是新社會的敵人。在作者看來，這種定位使商、學(知識份子)面貌曖昧，實際上已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以後年代知識份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命運(頁14)。

新政權在鎮反、管制專政對象及不斷清理內部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在作者眼裏，符合當時冷戰形勢和列寧主義邏輯，但是其必然後果是對敵鬥爭和實踐上的「擴大化」。由此而產生的「純化觀」，所造成的影響是全局性的。比如，在南方地區，那些在革命勝利前夕參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被普遍認為是「投機革命」、「混入革命」，而在鎮反運動中受到懲辦。與此同時，這種做法也造成了知識份子心理上的低氣壓。同時，在重視出身的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大量重用工農幹部，造成了幹部素質偏低的狀況。

在1953至1956年「階級出身論」發展的第二階段，革命專政進一步強化，政治分層細密化，革命隊伍內部清除異己份子的力度加大。在幹部的提拔任用、留蘇生的選派、調幹生的挑選中，家庭出身均成為首要的條件。從1953年起，「敵對階級」的範圍又有了很大的擴大，富農成為新成員。「反革命」的種類增加了，歷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為以及與舊社會聯繫較多的人員，都被劃入「歷史反革命」。1949年前的知識份子，一律被劃為「舊知識份子」。全社會形成了對資本家、知

識份子和「不純份子」的否定性和警覺性的評價。有些地區，出現「經常毆打資本家」的現象。部分地區將工廠的技術人員稱為「廢物利用」。由於左的情緒，農村中小學教師普遍不受尊重，運動一來就成為鬥爭對象。而那些在歷次運動中受衝擊的、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繫的「歷史不清份子」、「不純份子」，只能從事一些底層行業和出賣勞動力謀生。為了貫徹「階級路線」、「純化」社會環境，1950年代中期，曾有將幾個大城市的「不純份子」遷往西北等邊遠地區的極端舉措。

1957至1965年是第三個階段，以建立一個全面「純化」的新世界為宗旨。從反右運動開始，對民主人士、知識份子的劃分細密化。血統論有了新的發展，不少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也被打成右派。出身論的新發展是——思想不純正等於血統不純正，因之也就是階級敵人。單憑出身劃為右派的情況也有很多。在大躍進中，「階級出身論」更波及小學。之後，重視階級出身的意識在全民扎根。毛澤東在此期間不斷掀起階級鬥爭的高潮，「階級出身論」被全面激活，在實踐上發展成「唯成分論」，整個社會因此被分為成分好和成分壞的兩大陣營。從前成分好和成分壞黑白兩個階層之間，還有一個灰色地帶，容納了不少成分不好者。自1962年之後，灰色地帶完全變成了黑色地帶。對敵對階級出身的子女也有了各種歧視性的安排。黑類成員不僅毫無權利，甚至不能正常婚嫁。隨着對高級幹部的排隊及對黨政機關的新一輪清理，「純化」的

從反右運動開始，對民主人士、知識份子的劃分細密化。血統論有了新的發展，不少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也被打成右派。出身論的新發展是——思想不純正等於血統不純正，因之也就是階級敵人。重視階級出身的意識在全民扎根。

作者認為「階級出身論」在事實上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以紅色恐怖形式出現的階級歧視，在文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此，「階級血統論」比「階級出身論」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論色彩。

氣氛更加熾烈。作者認為在社會分層再確定的工程中，「階級出身論」借助意識形態傳媒的鼓動，尤其通過四清運動得到不斷強化，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氛圍，最終為文革期間的「階級血統論」的泛濫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礎。

雖然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應根據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來考察階級關係，但家庭出身和思想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階級屬性的標準。故作者認為「階級出身論」在事實上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以紅色恐怖形式出現的階級歧視，在文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因此，「階級血統論」比「階級出身論」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論色彩。到1970年代中後期，「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伴隨着階級鬥爭擴大化，幾乎使國人很少不直接或間接受打擊，尤其是原先血統和思想純正的領導幹部及其子女也被打倒，遭遇到和過去的地主和反革命份子一樣的凌辱和歧視。至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的荒唐已暴露無遺，並在中國共產黨最終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綱領後，徹底走向終結。

三 選題旨趣與研究範式

作者對中共黨史卓有研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一書被國內外公認是毛澤東研究的力作。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永發教授將作者與楊奎松

稱為大陸研究中共黨史的頂尖學者^②。在《紅太陽》一書中，作者寫的是延安整風，但卻將上限推至紅軍根據地初創時期的「肅AB團」，在作者精心的梳理和縝密的推理下，歷史的碎片一點點歸位，為讀者揭開了蒙着歷史真相的重重迷霧。顯然，它不僅僅是一部講述延安整風的著作，更應被視為一部重新建構、力求貼近事實的1921至1940年代的中共黨史。這樣一種新的黨史，其學術意義自不待言。

同樣，當作者以1949至1965年的「階級出身論」和政治分層作為研究對象時，也沒有局限在這個時段，而是將其放在中國共產革命的大背景下，揭示其社會歷史根源，釐清其遞進式的幾個發展階段。雖然作者沒有對文革時期的「階級出身論」作完全的展開，但是讀完此書，相信各位讀者已經對文革時期「階級血統論」的必然趨勢了然於胸了。

為甚麼選擇50、60年代作為當代中國史的研究時段？在另外一篇論文中，高華說明了這一點：50年代的歷史是當代史的開端，當時發生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我們當下的社會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今日之結構、框架，均奠定於此時期^③。基於此，近年來作者加強了對50年代中國史的研究。如圍繞着北京的政治鬥爭與地方的微妙關係、大躍進與國家權力的擴張、大災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乃至當代中國史史料學的若干問題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階級出身論」這樣一個選題，實際上是作者重新建構50年代中國史的一部分。

此外，高華對如何研究50年代的兩種當代史研究範式進行了批評：一種是「革命敘事」的視野，主題就是「凱歌行進」、「艱苦探索」、「挫折調整」；另一種是「現代化敘事」，即將這十多年豐富、複雜的歷史簡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他批評說，在這兩種敘事視野下，難以看到歷史的全貌，對那個時代無法獲得生動、具體的影像^④。作者提倡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⑤。所謂「新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敘述」對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資料選擇上的價值判斷，重視對各種史料——包括內容上互相衝突的史料——的收集、鑒別和廣泛地運用。「新實證主義」也強調對歷史細部環節的注意，注重從事實出發而不是概念先行，運用各種分析框架而不固步自封，強調總體把握也重視歷史的細節和差異。顯而易見，這些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當代史，都是極為重要的。

事實上，作者在其蜚聲中外的中共黨史和毛澤東研究中，已經自覺地採用了這種以客觀歷史觀為指導的新史學範式。這種範式集中地體現了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份子的訴求。它強調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採取客觀中立的立場，以對歷史的宏觀把握為前提，對史料進行廣泛的搜集和細心的考辨，意圖揭示歷史真實，避免由意識形態出發而產生的有意或無意的「歷史誤讀」。作為民間話語的突出特點，這種風格既

承接了中國古代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又凸顯了西方史學「客觀真實」的神韻^⑥。作者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學追求，受到一批學者的認同^⑦。

最後，很顯然，研究當代中國史因為與執政黨密切相關，所以也有與研究中共黨史同樣的苦惱。但是正如高華在評論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所作的書評中所言：「以國人而言，站在民間立場研究中共歷史，確是一項艱難而寂寞的事業，然而這又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⑧。這可能正是作者一直小心翼翼，迂迂而行，但卻一直不肯放棄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四 材料選擇與解讀

研究當代中國史，如何選擇、選擇甚麼樣的材料是一個關鍵。在寫作《紅太陽》時，作者並沒有用甚麼秘聞和爆炸性的材料，但是使用的材料非常廣泛。為了保持材料的平衡性，在經過仔細的考辨後，也用了一些傳統上受到忽視的材料（如張國燾、王明所寫）。最後，在材料很受局限的情況下寫成了這本著作。這一次的情況有所改變，作者較多地使用了《內部參考》這個雜誌，這是新華社記者為中共中央寫的一份內參，專為中央領導人了解實情而作，與正式的文件和具有宣傳性的報紙相比，是更為真實的材料。在幾處關鍵的地方，作者還使用了沈志華先生所收藏的俄國解密檔案。之所以重視前蘇聯的解密檔案，是因為作者認為蘇聯是二十世

作者提倡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所謂「新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敘述」對研究的支配，重視對各種史料的收集、鑒別和廣泛地運用，也強調對歷史細部環節的注意。

對毛澤東的解讀是解決「階級出身論」這一問題的關鍵。政治人物是複雜的，因此作者主張：對政治人物，不僅要看其言，更要觀其行。作者不同意國內外有些學者主要依據毛澤東的文集，就其思想展開敘述的做法，認為這是將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剝離開來。

紀影響中國最為深遠的國家，而且影響涉及各個方面。另外，這些檔案的原始性使得它們具有極高的價值，尤其是在國內相關檔案尚未開放的情況下。這些檔案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國內單一化的歷史敘述^⑨。作者還使用了一些普通人的回憶錄材料，這與作者一貫對普通人的回憶錄比較重視有關。從這裏我們當然可以看出作者的史料學見解，更能看出一個有着清醒頭腦的歷史學家的人文追求。

對毛澤東的解讀是解決「階級出身論」這一問題的關鍵。政治人物是複雜的，因此作者主張：對政治人物，不僅要看其言，更要觀其行，因為他們不是單純的思想型或學院型人物。作者還指出有時須透過文字才能看清底蘊，這就需要研究者具備一種穿透語言壁壘的能力。作者不同意國內外有些學者主要依據毛澤東的文集，就其思想展開敘述的做法，認為這是將毛澤東的思想與實踐剝離開來；尤其不同意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個概念，來研究1949年後的毛澤東和他領導下中國的三十年，認為此乃「將三十年的複雜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⑩由於有了這樣的認識，作者對「階級出身論」的分析就沒有停留在文本上，而是注意通過其實踐來釐清其思想意圖與脈絡。這對徹底搞清出身論和政治分層問題是很重要的，也是理解中國過去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關鍵。

50、60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史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最富張力的題材領域，任何一個有慧心的研

究者都會有發現重大題材的機遇。當然，由於諸多條件的限制，每個研究者常常面臨不能迴避的挑戰。正所謂，無限風光在險峰。

註釋

① 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載《中國鄉村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82。

② 陳永發：〈再版序言〉，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xi。

③④⑤⑥ 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頁85；82；83；83。

⑦ 參見蕭功秦：〈拒絕殘酷的美麗——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http://view.cchere.com/article/416962>。

⑧ 高華：〈在史料的叢林中——讀陳永發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6月號，頁121。

⑨ 高華：〈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載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華東師範大學思與文講座演講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82。

⑩ 高華：〈中國共產革命中的毛的因素〉，見高華官方網站專題報告部分：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xsyj/000045_4.htm。有興趣的讀者還可參閱作者的其他研究成果。

荆世杰 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博士生。